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7年第8期（总第72期）

上海与美国地方交流文章选编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编者按：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把中美地方交流做实做深，造福两国人民”的指示，长期致力于对上海与美国地方之间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展开研究，推动中美关系在地方层面的发展。今年以来，我所新出版《上海与美国地方交流年度大事记(2016)》、《在上海的美国人》(第三辑)两部著作，受到多方好评。本期《研究与参考》选取《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沪美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启示》和《沪美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三篇文章，从法律、文化、体育等角度探讨上海与美国之间的交流，回顾历史，探究现实，启迪未来，供相关领导和专家参考。

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上海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方之寅

[内容提要] 上海共有 57 家美国律师事务所。本文回顾并总结了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发展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并试图分析美国律师事务所在加强上海和美国地方交流、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和发展等方面的贡献,并进一步探讨如何为美国律师事务所提供公平的待遇和竞争平台,扬其所长,调动其积极性,以求互惠共赢。

[关键词] 美国律师事务所 上海经济 地方交流

[作者简介] 方之寅,美国戴维斯·莱特·特里梅因律师事务所(Davis Wright Tremaine)资深合伙人,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比较法)(Ph. D in Comparative Law),华东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果。随着中国加入 WTO,在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外国先进的服务业,其中包括法律服务业,也随之进入了中国市

场。2016年9月,根据司法部2015年年检后的统计,全国共有229家来自外国和港澳台的律师事务所设立的驻华代表处^①。在国别上,美国律所的数量居首;在所在城市分布上,上海拥有外国律所总数占第一。上海共有129家外国和港台的律师事务所,其中美国的就有57家^②。这57家美国律所来到上海长则20来年,少则也有1—2年。他们有历史,有故事,有经验,也有教训和抱怨,在为客户服务的同时,也促进了上海经济发展,为上海的发展和转型做出了贡献。回顾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发展的历史和生存现状,总结其在加强上海和美国地方交流、促进上海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贡献,对于进一步探讨如何为美国律师事务所提供公平的待遇和竞争平台,扬其所长,调动其积极性,以求互惠共赢,是很有必要的。

一、在上海美国律师事务所在的历史和生存现状

纵观中美法律交流和美国律师事务所到上海开展业务的历史,大致分三个阶段。

(一) 投石探路

“兵马未到,粮草先行。”早在中国对外开放早期,美国律师的身影就已活跃在上海。他们对当时中国第一批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在内的六部法律,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开始为客户投资经商投石问路。1984年,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召集,经前卡特政府国务卿万斯牵头,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上海投资信托公司和华东政法学院联合会同美国一些著名律师事务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2016年166号(2016年9月12日发布),www.moj.gov.cn。

^② 同上。

所和大公司的法务部门,针对上海在引进外资中广为关注的法律问题,连续举办了两场大型国际经济法研讨会。第一次是当年2月,探讨的专题是国际技术转让,第二次是11月,专题是投资法。这两次研讨会的召开,充分显示了美国律师事务所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关注和兴趣,以及将其业务扩展到中国尤其是上海的意愿,同时通过与中国法律工作者交流,加深了对萌芽中的中国法律的了解^①。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进入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探索。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后就有几家美国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如贝克·麦肯坚、宝维斯、高特兄弟、格杰和迈克卿等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变相”地设立了办事处。由于当时中国不允许设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这些律所或是通过设立“咨询公司”的方式,或是以客户的投资企业法务部的名义,为客户提供咨询,游走在“灰色地带”^②。

(二) 探索试点

1992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各级政府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招商引资。与此同时,中国开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为贯彻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国司法部于1992年年中开始了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国内设立代表机构的试点,首次批准了美国高特兄弟等12家来自英美和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设立办事处。同年10月,司法部又正式发布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办事处有关事宜的通知”^③,正式开启了中国法律服务行业的大门。次年9月,戴维斯·莱特·特里梅因律

① 《国际经济法讨论会——上海国际技术转让会论文集》,《法学》特刊,1984年。

② Jane J. Heller, “China’s New Foreign Law Firm Regulations: A Step in the Wrong Direction”, 12 Pac. Rim L. & Pol’y J. 751, 2003.

③ “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办事处有关事宜的通知”,司发通[1992]105号(1992年10月30日发布),<http://law.lawtime.cn/d500240505334.html>。

师事务所(Davis Wright Tremaine, 简称 DWT) 获得司法部批准, 成为第一家在上海设立代表处的美国律师事务所^①。此后, 前来中国设立办事处的外国律师事务所逐年略有增加。从第一批美国律所获得执照起到 2001 年底重新核准执照止, 获准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的美国律所总共只有 10 家^②。而且在这一阶段, 每家律所只限于设立一个办事处。因此, 外国律所主要还是局限于北京和上海。

(三) 入世承诺后的开放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 WTO, 国务院于 2001 年 12 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颁布了《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进一步放宽了对外国律所的限制。主要表现在解除了对外国律所跨市设立办事处以及代表客户参加仲裁方面的限制。除此之外, 无论是条例还是实际执行均没有太多实质性的突破。尽管外国律所数量有相当的增加, 但这并不是由于中国入世承诺的兑现, 而更多的是这些外国律所为中国经济发展、市场潜力以及客户要求驱动的结果^③。

根据“条例”, 外国律所持有的执业许可是受限制或者说是“有限的”。根据“条例”的规定, 外国律所不得在中国境内从事“中国法律业务”。所谓

^① 笔者是 DWT 上海办事处的创始合伙人。1993 年, 与同事们一起开办了 DWT 上海办事处。二十多年来, 笔者往返于中美两地开展业务。本文不少内容是基于笔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和观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公告”, 2001 年 12 号, www.moj.gov.cn。

^③ 据有关调查和分析, 在美国的中国律所很难盈利。近年来, 既有新设代表处的美国律所, 也有退出注销登记的美国律所。最近退出的就有早在 2000 年就在上海设立办事处的美国百强律所之一: 查德本·派克律师事务所。Stern, R. E. and Li, S., “The Outpost Office: How International Law Firms Approach the China Market”, *Law and Social Inquiry*, No. 41, 2016, pp. 184 - 211. doi: 10.1111/lsi.12138; “Foreign Firms in China, Looking Beyond the Hype”, *The Chinese Legal Profession*, Vol. 2, Issue 6, September 2016.

“中国法律业务”^①包括(1) 以律师身份参加诉讼活动;(2) 就书面文件中适用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提供意见;(3) 就适用中国法律的行为或事件提供意见;(4) 在仲裁活动中,以代理人身份对中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②;以及(5) 代表委托人向中国政府机关办理各项手续^③。尽管如此,“条例”允许外国律所“提供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④。但是,何为“适用中国法律”的“意见”,何为“提供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司法部未作明确的界定。

目前,据了解,美国律所在上海主要有几大块业务。一是传统的帮助美国和跨国公司在中国从事直接投资和跨境公司并购以及与之有关的重组和其他商务活动。二是涉外的资本市场业务,如帮助中外企业策划融资结构和模式、境内外风险投资和私募,直至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地区上市以及境外信贷融资活动。三是与律所的美国或所在国的团队一起,代表中国公司从事跨境并购和投资。四是代表中国公司在美国参加诉讼、仲裁以及行政程序。近年来,随着美国加强了对《海外反贿赂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简称 FC-PA)的执法力度,代表涉嫌美企参加应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和指控,展开独立调查,为员工提供合规培训,正成为美国律所一块新的业务。

① 司法部关于修改“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73号(2004),第五章第三十二条,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4.40767。

② 司法部关于修改“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92号(2004),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4.55701。

③ 司法部关于修改“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73号(2004),第五章第三十三条,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4.40767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338号(2001),“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第三章第十五条,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2.38116。

二、美国律所在上海经济转型和 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历史过程来探讨,美国律所的作用是独特的,也是不可替代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美国律所在上海对外开放早期招商引资中的独特作用

美国律所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帮助上海贯彻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为上海当年的经济起飞带来了当时急需的资金、技术和管理。中国,包括上海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就是对外开放初期的外商投资,可谓门可罗雀,屈指可数。当年上海市长汪道涵在国际会议上如数家珍般列举的中外合资企业,也不过十来家,其中中美合资企业也只有施贵宝制药、福克斯保罗、高士香精等 4—5 家而已^①。即使有外商表达了来上海投资的兴趣,谈判也像马拉松,一谈起码就是几年。这固然是由于中美两国语言文化和理念上的差异,尤其是政治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但刚刚从“文革”思想桎梏中摆脱出来的中国政府官员和当时基本上清一色的国企,更给外商投资谈判和审批设置了一道无形的障碍。而外商则处处显示了对中国这一“神秘王国”和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疑虑、兴奋和猜忌,面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当时的上海要吸引引资,显然需要有人从中牵线搭桥,帮助双方沟通。

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他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东道国的法律制度和环境。在这方面,律师起到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方面是同 90 年代初中国的法律环境分不开

^① “汪道涵在上海国际技术转让会上的讲话”,《国际经济法讨论会——上海国际技术转让论文集》,《法学》特刊,1984 年,第 1—2 页。

的。具体表现为：第一，法律不健全。在外商投资领域，自从1979年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总共才只有三个涉外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商独资企业法》及其配套的三个实施细则；在民商法领域，没有调整商事法律关系的最基本的公司法；民法虽有，只有通则，却没有物权、债权等重要分则；为适应计划经济模式，当时的合同法还分成经济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一部对内，一部对外。第二，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刚刚成形，远远达不到美国公司的期待和要求。律师不但人数少，业务水平参差不齐，英文表达沟通有问题，更主要的是当时律师条例对律师性质的界定保留有旧体制的色彩，光是“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这一句话就把美商吓跑了。美国公司通过律师来了解当地的法律环境，找美国律师成了必然的选择。

另一方面，美国公司长期以来对律师的信赖和依赖，以及律师在投资商务活动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首先，美国法律完备，判例成熟，管制严格，各项商业行为需协议合同加以保护，避免风险；同时又需确保合法合规。因此，当时对中国有投资愿望又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尤其是那些上市公司，都有负责法务的公司高管，设有规模不等的法务部，有法务预算，事事由律师把关，已成习惯。其次，在美国，律师和客户之间，超越了供方和买方的一般的商务关系，更具有人与人之间那种人性化的信任和信赖。律师的客户用英文表达是“client”而不是“customer”，这是在美国法律环境下双方在长期合作、了解中培养而成的信任关系。律师的法律咨询是在对客户公司文化、产品和发展战略全面了解基础上作出的。美国公司习惯了美国律所的服务。因为从美国律所那里，他们可以习惯地获得可以期待的法律服务产品。更重要的是，美国律师之所以受到客户的信任和信赖，离不开美国法律以及律师执业操守规范的保障。律师有严格的职业操守约束，忠

于客户,可以信赖^①。美国律师协会标准职业操守规则将律师这一职业定义为“客户的代表、法律制度的执行者和对确保公平正义负有社会责任的公民”,要求其为客户保密,勤勉热忱地为客户提供法律咨询,在对方得到公正对待前提下为客户谋取最大利益。此外,律师获取报酬的方式,即根据小时费率按服务时间计收报酬,报酬与项目成功与否不挂钩,也从一方面保证了律师意见的客观性。

由此可见,美国律所在招商引资中的作用并不是一般人理解中的“牵线搭桥”作中介,帮助物色寻找合作对象,然后带着一批美国人飞到上海谈项目,而是在职业操守规则的制约下,凭借美国公司长期以来对律师的信赖,通过专业学识和法律服务这一独特方式帮助美国和跨国公司客观地了解中国及其法律制度,增强投资信心。

以美国戴维斯·莱特·特里梅因律师事务所为例,1993年,该律所获得批准开业不久,福特汽车来敲门了,沃尔玛也来了,不到一两年时间,GE、波音、国际纸业、固特异和其他著名的跨国公司也都先后成了该律所的客户。就这样,该律所凭借对中美两种文化制度的熟悉和了解,客观地将中国法律制度和投资环境介绍给客户,从法律上帮助他们分析利弊风险,作出知情的决策。律师,尤其是美国律师的一个特长是项目筹划上具有创意,善于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提出建设性方案。当时中国法律不健全,律师就建议强化合同文本,用尽可能详尽的合同条款将法律缺失的内容写在合同中。当时也有外商抱怨中国法律多变,律师就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将合同订立

^①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 Preamble & Scope, http://www.americanbar.org/groups/professional_responsibility/publications/model_rules_of_professional_conduct/model_rules_of_professional_conduct_preamble_scope.html.

时有效的法律予以“冻结”或用合同条款规定万一出现不利于客户的法律变更时的解决方案,从而将不利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总之,美国的律所通过服务,在中国法律的框架内,最大限度保护客户的权益,识别、规避、控制或减少投资风险。如实的介绍、客观的分析和创意性的建议和策划,大大增强了美商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例如,当年福特汽车了解了中国法律制度和投资环境后,开出了长长的在上海的项目计划,打算从与上汽集团合资的延锋、福电和福耀等汽配项目切入,扩大合作范围,直接瞄准上海整车项目。

(二) 将国际视野和最新的商业模式、法律实务带到中国,尤其是上海,帮助其加速与国际接轨

英美的法律服务,尤其在非讼业务方面,一向以创新闻名,代表了国际商业交易的发展方向,引领着世界商务模式的新潮流。比如,美国的法学院开设有“担保交易”这门课,英文为 Secured Transaction,讲的是动产抵押质押担保制度。由于这项法律制度规定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九章,通常亦俗称UCC-9。它关于顺位处理、浮动抵押、平和重新占有以及抵押物出售抵偿债务等方面的规定,环环紧扣,天衣无缝,公平合理,既保护了债权人,对债务人又不失公平。正是这项制度奠定了债务融资交易的基础,保证了市场化的资金流动^①。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应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作过这方面的专题讲座,与国内同行和金融经贸方面的专家们进行交流。几年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和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赵启正,把几

^① 《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 Code)是一部由美国法律研究所和美国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于1952年完成并经美国律师协会批准,作为各州制定商事法律的统一参考文本。目前,美国各州不同程度上采纳并通过了这部法典作为本州法律。例如,加利福尼亚州议会于1963年通过了这部法典,并于1965年1月1日生效。Parker's 2016 California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Division 9 Secured Transactions, Lexus Nexus Matthew Bender.

位外国律所的律师召集去开了个座谈会,为浦东进一步吸引外资出谋划策,当时的上海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笔者就提出了一个观点,建议在立法大环境尚不成熟的时候通过地方立法先为外商创造一个外商熟识和习惯的市场化的小环境,其中包括引进类似《美国统一商法典》那样的制度,让资金融通活起来。赵市长对笔者的建言很重视,表示要研究,并向上反映建议。几年后,中国出台了自已的担保法和财产抵押质押制度,工商局成了法定的动产抵押登记执行机关。当然笔者只是许多提建议的人之一。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律师事务所通过中美法律交流起到的积极作用。

又如,美国硅谷的崛起在于技术创新、人才和资金的结合。三大因素相互依赖,缺一不可。技术创新是硅谷高科技公司的生命之源和立业之本;而技术的创新又离不开科学家、工程师们思想火花的迸发和锲而不舍的研发与攻关;无论是新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还是对科技人员的激励,都需要资金的支持。早在 60 年代,英特尔就通过诺伊斯、摩尔和格鲁夫三位科学家^①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研发成就和洛克风险投资相结合,开创了硅谷的“创业文化”,激发了员工的创业精神,颠覆了员工历来处于底层被管理的那种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这种创业文化和管理体制又在格鲁夫任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为全世界提供了技术、资本、人才成功结合的范例^②。而融资方面的创新,如风险投资、私募等,又从法律和制度上推动和保障了技

^① 有一种说法是,格鲁夫虽然是英特尔的第三名员工,但由于他不是最初原始普通股的持有者,英特尔创业团队应只有诺伊斯和摩尔。<https://zh.wikipedia.org/zh/英特尔>.

^② 同上。另见 *Venture Capital Helped Create Silicon Valley and Startup*, researched by Thomas DeMichele as of October 4, 2016, factmyth.com/factoids/venture-capital-helped-create-silicon-valley-and-startup-culture/。

术上创新。随着硅谷崛起和创业文化的广为接受,美国律师们由之摸索并开发出一整套服务于创新融资和创业文化的独特的法律结构和模式。例如,股票认购协议和公司章程中根据权责对应原则对股票种类(普通和优先)、系列和轮回的区分和设计,以及优先清算权条款,保证了创业者获得激励,投资者获得保障;股价调整机制或俗称“对赌协议”,又将创业团队的利益与企业经营进一步挂钩;保护性条款则给投资者在影响其关键利益的问题上,提供了最基本的保护;回购、出售和上市等退出机制确保了投资股权的随时变现;还有员工股权激励以及离岸红筹股模式等。所有这些模式和文本条款,从法律和制度上推动和保障了技术上创新^①。这些模式的设计筹划、法律文本、监管及其应对,可以说都是通过外国律所尤其是美国律所一个项目一个项目介绍引进到中国 and 上海的。中国的同行们从听说、接触、学习、理解到精通,不少人在这一过程中因此成了行家里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文搜索引擎龙头百度、户外视频广告运营商分众传媒和在香港上市的中国乳制品龙头之一蒙牛,都采用了上述离岸红筹股模式、风投私募和员工激励的结构和机制^②。可以说,中国今天创业文化、投资基金和风投私募的风行,离不开美国律所起到的领头作用。正是他们的专业服务,将这些国际上最新的商业模式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

带动中国国内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与国际管理模式接轨,是美国律所起到的又一个作用。美国律师事务所的组织结构一般都采用有限责任的合伙制或股权制。历史悠久,聚久不散,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业务越做越强。近

^① 美国风险投资协会:《美国风险投资示范合同》(中英文对照本),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律师协会风险投资委员会组织编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石育斌:《中国私募股权融资与创业板上市实务操作指南》,法律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7—70 页。

年来随着律师事务所之间的跨国合并,律师人数在千人以上的就有十几家。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务所的治理、管理和分配制度。正是这样的制度确保了合伙人利益,及其对事务所的贡献、带来的业务和收入密切挂钩,从而激励合伙人创收又确保团队合作。而当年外国律所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中国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尚处在萌芽状态。虽有做大做强的雄心,但在管理和分配方面缺乏经验,往往规模做大了,却因分配不公而散伙的时有耳闻。有的即使维持着数百名律师的大规模,但内部却“山头林立”,每一山头构成自负盈亏的经营中心,没有“交叉营销”,也形成不了“强强联手的团队”。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美国律所来到上海,开辟了一个中美律所交流的平台。通过相互走访、讲座介绍、探索讨论以及律师的流动,国内律所通过逐步接触了解,加深了对美国律所先进的管理分配制度的理解,并扬长补短,予以引进,从而出现了一批有相当服务水准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律师事务所,如君合、金杜、中伦、方达等。

(三) 促进人才的交流和上海法律人才高地的形成

简言之,外国律所培养,国内律所受益,从客观上提升了上海涉外律师的业务水准。美国律所的律师业务素质相对较高。这里有多种原因。第一是门槛高,入门难。在上海设有办事处的几乎都是美国一流律所,声誉好,起薪高,由此吸引了众多来自名校的学生前来申请,并经过严格的筛选。例如,大的律所每年秋季都会到全美各地著名法学院招聘二年级学生进行暑期实习,先在实习中考察,然后再根据表现给予毕业后正式聘用邀约,由此保证新律师的高起点。即使是中国办事处的招聘也不马虎。据了解,不少美国律所招聘律师的第一道关就是实务考试,测试应聘律师中英文文件转换能力以及分析和书面表达能力。通过了考试才考虑是否给予面试机会。第二是严格的培训,尤其是老律师言传身教的培训。有的美国律所还会资

助有前途的年轻律师去美国进修深造,或定期安排其国内办事处的年轻律师去美国总部实习,了解美国法律实务。第三是亲身参与各种复杂的交易。四是严格的考核制度,半年一次,优胜劣汰。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要4—5年,生存下来的律师就会有较强的分析能力和扎实的文件起草功底。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开放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美国律所纷纷抢滩上海,曾出现了美国律所高薪挖人的现象。但是,国内法律界人才市场是流动的。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律所做大做强,又出现了人才倒流的现象。不少这样的律师往往过了若干年后,翅膀硬了,就面临新的选择。不少人在做“鸡头”还是做“凤尾”的选择中,选了做“鸡头”,或跳槽加盟国内律所,或合伙创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用自己在外国律所积累的经验 and 专长,直接为客户服务。可以说,目前国内几家著名的大律师事务所的骨干合伙人,都有在外国律所的工作经历^①。例如,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就在纽约工作好些年后才回国^②。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是美国律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却也从客观上推动了上海涉外律师人才的培养,造就了上海法律人才的高地。

(四) 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跨国经营

自从对外开放以来,中美之间经贸活动日趋频繁。近年来,随着中国《境内企业境外投资的规定》的出台,以及国内一系列法律程序及制度的进一步完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国门的步伐,在国际商业大舞台

^① 2017 钱伯斯排名:谁是中国最顶级的律师? 2017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zhihe-dongfang.com/article-25728/>。例如,位于银行金融法榜首的君合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刘大力、润明律师事务所的刘屹和金杜律师事务所的王军,均有在英美律所工作的经历。 <http://www.kwm.com/>, www.junhe.com/, www.runminglaw.com/。

^② 高西庆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item/%E9%AB%98%E8%A5%BF%E5%BA%86>。

施展拳脚,其中也包括到美国通过直接投资和公司并购,稳定原料资源供应,获得先进技术和品牌,打入国际市场,在跨国化经营的过程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在美国从事并购,会涉及交易结构的策划,可能需要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批,法律文件的起草、谈判、修改和最后的交割,均离不开律师的指导和参与。随之而来的商业纠纷也越来越多。相当一部分纠纷最后体现为美国的司法诉讼或行政程序或两者结合。近年来在美国发生涉及中国当事人的诉讼和行政程序大致分三大类:一是贸易法纠纷,如反倾销和 337 调查程序;二是关于知识产权侵权和不正当竞争的诉讼;三是合同纠纷。因此,中国公司在美国的法律需求也越来越多。

日趋紧密的经贸关系同时也对法律服务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美国进行的这类交易和诉讼适用美国法律,即使某些引起争议的合同规定中国法律或其他外国法律为适用的实体法,但诉讼的程序必须严格地按照法院所在地的程序法以及各法院的法院规则,而且,适用的法律有联邦的、州的,还有市的。例如,在美国买地开发房地产会涉及到土地的产权分割、城市规划和用途许可等市政法规和程序,少走或走错一步,都有可能给项目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不仅如此,美国法律分得很细,但又复杂,由此,律师也各有专长。一个并购项目需要由各具专长的律师组成的团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商业活动涉及美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经常会出现两种文化理念和制度的碰撞,迫切需要沟通和交流,让中国的客户作出知情的选择,“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面对这种需求,美国律所,尤其是那些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美国律所就体现了远远超越国内律所的能力,具有无法替代的优势。在这一过程中,在中国设有办事处的美国律所既有纯美国律所的经验团队优势,又有中国办事处律师们的就近服务,还有对中美文化法律和制度的熟悉了解以及较强的沟通能力,他们的优势和作用就更加

显示出来了。

被列为中国十大涉外诉讼案的美国劲量公司诉中国双鹿等电池企业侵权的“337 调查”,由美国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担任中方的诉讼代理。在历时 6 年的程序中,劲量公司在裁定其专利无效后仍不依不饶三次上诉。但双鹿和其他被告企业在该律所美中团队的沟通和帮助下,确定应对策略,最终换来了美国最高法院拒绝劲量公司的申诉,从而使这起“337 调查”案以双鹿电池为主的中国应诉企业不侵权获得胜利,维护了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利^①。

又如 2006 年,针对东方航空公司发生在 2004 年 55 人遇难的包头空难事故,有一群既非美国公民也非美国居民,更与美国没有任何“实质性”联系的遇难家属在美国洛杉矶地方法院对东航提起了索赔诉讼。法院管辖的唯一依据是东航飞洛杉矶航线,在洛杉矶设有办事处。原告律师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好几位在美国法学院任教的中国法学家的专家证词,质疑中国法院的公信力,并动用了西方媒体,一度搞得沸沸扬扬。当时代理此案的美迈斯律师事务所上海办事处和美国总部的律师组建的辩护团队,帮助被告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据理反驳,最后成功地说服法院批准被告动议,中止诉讼,命令原告在中国法院起诉。法官认为,此案最合适管辖的法院为中国法院^②。

上述两起案件,有着相当的难度。美国律所在帮助中国公司走出国门中的优势和作用,由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① 律师在线/评述:双鹿电池等企业胜诉美国“337 调查”案,<https://www.elawer.com/article/422064552.html>。

^② 包头空难民诉“回归”,2009 年 8 月 17 日,财新网,<http://m.magazine.caixin.com/m/2009-08-17/100085085.html?sourceEntityId=100715458>。

三、思考和建议

如前所述,自 1992 年中国有限地对外开放法律服务市场以来,美国律所在帮助上海引进当时急需的外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推动及加速上海与国际接轨、建立上海法律人才高地并帮助中国和上海企业走出国门跨国经营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律所进入中国,对市场虽有冲击,但相对于正面的作用而言,负面影响是有限的。相反,这一有限开放过程恰恰带动了国内律所业务水准的提升,竞争能力的增强。事实证明,美国律所是上海建设和发展的参与者,不应被视为异己力量。

从更高的层面上看,活跃在上海的美国律所也是中美地方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他们正以其独特的方式对构筑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作贡献。法律从来就是治国经商之本。在跨国经营中,律师通过法律服务帮助客户从文化、社会、理念和制度方面了解、理解、尊重对方,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并学会运用东道国的法律保护自身权益,这本身就是两国民间、地方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想象,这种交流随着中国律所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将业务开展到美国,将会变得更加密切。

2017 年新年伊始,中国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①,提出了积极推进中国涉外法律服务业发展的设想和措施,其中包括培养“在业务领域、服务能力方面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涉外法律服务机构”“支持国内律师事务所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海外并购、联合经营等方式,在世界主

^① 司法部、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印发《关于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的意见》(2017 年 1 月),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4.288189。

要经济体所在国和地区设立执业机构”“支持并规范国内律师事务所与境外律师事务所以业务联盟等方式开展业务合作”,以及对原有条例的修改。期盼中国政府能够在实施意见的过程中,肯定外国律所的积极作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对外国律所监督管理的同时,与时俱进,逐步放宽对外国律所在华业务的限制;在自贸区试点探索国内外律所合作方式的基础上,逐步向区外推广;同时取消某些不合理的限制。^①

发展引来竞争,竞争促进发展。公平竞争平台的逐步形成,必将推动涉外法律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

^① 对外国所在仲裁程序中不得对“中国法律的适用发表意见”的限制从法理上是没有依据的。仲裁不是国家的司法行为。仲裁的本质是当事人的一种合意管辖,是合同的延伸。在仲裁中,法院不得予以干涉;审理案件的仲裁员甚至可以由外籍人士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2009年修正),第67条,北大法宝,【法宝引证码】CLI.1.167108。试想,既然连对于案件的是非曲折(当然包括中国法律为依据的是非)都可以由外籍人士裁定,为什么外国律师却不能在仲裁程序中谈对中国法律的看法呢?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半叶 沪美文化艺术交流的历史启示

杨展业

[内 容 提 要] 二战结束后,美国文化对中国及上海的输入与影响达到了最高峰。包括文学、戏剧、电影、流行音乐舞蹈、时尚生活方式等在内的美国文化,渗透到了上海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催化了一些本地新兴艺术品种的诞生,甚至改变和造就了上海市民的群体品格与风俗。本文回顾并总结了上海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的美国因素,同时对上海未来如何成为既有国际风范又不失本土特色的现代化国际性城市,提出了建议。

[关 键 词] 上海与美国 文化艺术交流 城市发展

[作 者 简 介] 杨展业,第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常委、国家一级编剧、原《新民晚报》高级记者

对外开放是近代上海最大的优势和特色。自 1843 年以来,对外开放贯穿了上海发展至今的历史。这一百七十多年,在封闭衰败的中国融入近代世界大潮、经历革命的阵痛与新生、而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对外开放深刻地改变了上海,欧美先进文化和江南本土文化、革命先锋文化在上海交织互

补,铸成了城市文化独特的结构、内涵、性格和气质。

不难看到,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遇期,美国文化对上海的影响不及英法文化,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美国文化开始以自己鲜明的特质和个性辐射全世界,至二战结束之后,对中国及上海的输入与影响达到了最高峰。包括文学、戏剧、电影、流行音乐舞蹈、时尚生活方式等在内的美国文化,渗透到了上海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催化了一些本地新兴文艺品种的诞生,甚至改变和造就了上海市民的群体品格与风俗。今天在回顾上海城市文化形成史的时候,美国文化所起到的作用不能忽视,应该写上公允的一笔。

回眸历史可以看到另一种特殊景象。1949 年之前的诸多岁月,中国与欧美的文化交往事实上处于不平等、不对等的状态。基本上,中国文化输出极少,而欧美文化则大举输入,甚至是倾销。造成这种畸形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这本来就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其次,当时的社会精英力求注入大量欧美先进文化,帮助中国从衰败走向新生、从封闭融入世界,这是历史的需要;最后,忙于不间断战乱的国民政府根本无暇与外国商谈文化对等交流,或者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意识。然而,就是在如此失衡的状态中,在上世纪前半叶的上海,中美文化交流结出了有利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进步、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艺术推进发展的众多果实。

今天,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中国全面深入改革开放,上海再一次站到了历史的交叉点上,被推到面向世界的前沿。我们应如何建设一座既欢迎和吸收人类文化成果和智慧结晶,又富于自己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特色和创造能力的现代城市?我们的前辈精英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留给后人作为启示?这无疑是一个富有现实意义、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尊重人类的精神活动成果,对外部世界的先进文化艺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但这种“拿来”并非私下占有以炫耀于国人,并非盲目抄仿以招摇于一时,而是立足于为中国的现实服务,通过虚心学习后付诸实践,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前辈精英们给我们留下的第一个启示。

话剧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引入是这方面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例。距今一百二十年前,1896 年的 7 月 18 日,由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1905 年改名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剧社,在夏季结业式上用英语演出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报道了这次演出,并刊登了剧照和评论,认为演出不仅有模有样,而且确实掌握了这出戏的精神。^① 过去一般认为,话剧在中国最早出现于 1907 年,即由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留日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作为开端,然而上海圣约翰书院学生在中国本土的演出,比这早了十一年,且有史可查,有照片为证,有演出团体(学生剧社),有文学剧本(莎翁原著)。这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根据我们目前已知的资料,由中国人演出西式话剧,从这一天开始。可以说,话剧的出现是早期中美文化艺术交流的直接产物。

在话剧引入之前,戏曲是中国舞台上唯一的戏剧样式,它有严格繁复的表演程式,内容多为宣扬忠孝节义,夹杂许多封建糟粕。在中国的广袤农村,戏曲是向民众传播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主要载体。因此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前夕,旧戏曲成为进步文化人批判的对象。胡适在《文学

^① 袁国兴主编:《清末民初新潮演剧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6 页。

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将旧京剧称为“遗形物”，“形式虽存，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知识界领袖人物都对旧戏曲采取猛烈抨击和彻底否定的态度。鲁迅也与旧戏曲势如水火，认为非废除不可。^①

从这一历史背景切入，便不难理解话剧（早期又称新剧、文明戏）在中国出现的非凡意义。它是一场以新思想、新文化取代旧思想、旧文化的革命。它将欧美新的戏剧形态介绍到中国，不受戏曲的程式化表演束缚，无论故事取材还是舞台呈现，都相当自由。当时圣约翰书院的学生不仅演出莎士比亚戏剧以传播人文主义思想，还将中国题材编成剧本用汉语演出，如 1899 年的圣诞节，编演了《官场丑史》，从剧名看，应是一出批判清末腐朽政治的戏剧，此后形成了每年圣诞夜自编自演中文戏剧的惯例。这些演出虽然只是在校内进行，受众范围不大，但圣约翰书院的学生都是当时上海及中国的上层政商名流富家子弟，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继圣约翰书院之后，上海的其他外国教会学校也纷纷开展演剧活动，有的在题材选择上更为切合现实，如南洋公学、育才公学的演出内容均直接关注了时事政治。更重要的是，圣约翰书院等外国学校的早期演剧活动，为中国话剧作为一个新兴而富有活力的文艺品种正式登上公众舞台做好了人才、演技、剧本内容、剧团组织等各方面的准备。

19 世纪最后十年和 20 世纪最初十年，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新旧思潮和旧文化在中国剧烈碰撞，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新兴话剧在此时一经出现，立即与急于寻找一种有效方式以传播民主意识、唤醒民众奋起的进步知识人士一拍即合。留日

^① 刘珺：《中国戏曲对外传播的跨文化障碍》，《戏曲艺术》，2010 年第 2 期。

学生的演剧团体春柳社认为,话剧“优于有声无形的演说及有形无声的图画”,“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① 而中国话剧在国内外的第一次社会化亮相,均是演出根据美国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翻译改编的《黑奴吁天录》,时间在 1907 年,首先是春柳社于 6 月在东京按分幕形式用通俗口语演出,随后,由赴德留学归来的王钟声创立的春阳社于 10 月,在英国侨民建于上海虎丘路的兰心戏院再度演出。美国教会学校和美国文学为中国话剧的起步铺开道路,这决不是偶然。文化交往的第一步是打破语言障碍,文学作品的译介是最初步也最易行的交流方式,而在 19 世纪末,《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美国小说正是最早译介到中国的西方文学作品之一,小说的人物故事虽然离中国遥远,但其中蕴含的对不平等的种族压迫的反抗精神,却在处于清王朝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民众中引起了广泛认同。当时的话剧演出往往与演讲结合,春阳社在上海兰心戏院演出《黑奴吁天录》时,王钟声不仅扮演剧中女奴角色,还在剧终后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谴责清政府与西方殖民者陷人民于水火的恶行,鼓动现场观众购买筑路股票,支援反对英国人侵犯中国铁路权的保路运动。王钟声后来率领剧社奔走苏杭与天津,编排演出《秋瑾》《徐锡麟》《爱国血》《共和万岁》《官场现形记》《宦海潮》等颂扬革命志士、启发民智的新剧,他本人在参与革命党人的起义中被清政府串通租界捕房逮捕,毫不屈服,英勇就义。

话剧这种外来的西方戏剧样式,被具有家国情怀、社会担当和民族责任的先驱者们一经“拿来”,便紧密结合中国国情,植下了直面现实、忧国忧民、教化大众、呼吁解放的优良传统。中国的新兴话剧运动,在发轫之初可谓壮怀激烈,此后,一直成为中国革命宣传的重要方式之一,包括在抗日战争期间,奔波

^① 黄飏:《海上新剧潮——中国话剧的绚丽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1 页。

于内地城乡艰苦演出的抗日演剧队,同样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回眸以往,话剧的引入与推广是 1843 年上海开埠至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中国与美国的文化艺术交往结出的一个富有历史价值的成果,而其间中国前辈精英们的学问、胆识、眼光、实践能力,以及他们所坚持的“拿来”必须为我所用、为国家民族的进步而服务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记取和学习的。

二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无论外方的文化有多么先进、多么强势,哪怕形成压倒式的倾销态势,仍顽强地坚守自己的独立文化品格,既在模仿中学习,又在学习中创造,在创造中成熟,最终在人类文化交融的土壤里,让本民族的文化艺术之花得以冉冉生长、迎风绽放,这是在过去时代极其不对等的中美文化交往中,我们的前辈精英创造的奇迹,也是他们留给今人的又一珍贵启示。每当思及前辈们在域外文化一边倒的艰难环境里成功书写自己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彩篇章,便不禁令我们感佩之至。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上海形成的中国民族电影第一个黄金时代,是这方面的杰出例子。

在 1949 年之前的中美文化交往中,电影毫无疑问是对上海产生过最大影响的舶来品。美国电影进入上海的时间较早,1897 年 6 月,即电影在法国诞生后仅一年半,美国商人詹姆士·里卡顿(另称雍松)即携带影片来到上海,在天华茶园等处放映,主要是记录风光民俗的短片。可以说,上海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电影的城市之一,美国是最早将电影引进中国的国家。这一不解之缘,此后绵绵不绝。1909 年,美国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亚细亚影业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公司。1913 年,这家公司的中国雇员郑正秋、张石川导演了故事片《难夫难妻》,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

上的电影。1919 年,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来上海拍摄风景,亚细亚影业公司的中国技术人员随同学习六个月之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美国电影制作方式。至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美国电影由于科技突破获得巨大生机,有声电影取代默片,同时美国文化艺术开始以自己的个性彰显于世,好莱坞因此聚集了大批商人和艺人,成为电影工业的世界中心,美国电影开始了对华的大规模输入。而上海作为一个五方杂处、华洋共居的移民城市,其国际化和开放性的城市氛围、庞大的市民小资阶层、崇洋趋新的社会风气,为好莱坞电影在此大行其道提供了极为适宜的环境。

美国电影对华的大规模输入,当时到了什么地步,听后是要令人咋舌的。据资料记载,1930 年,在中国发行的美国电影不下 540 部。1933 年,共有 433 部外国长片输入中国,其中 353 部是美国影片,这就是说,中国电影市场几乎每天有一部好莱坞新片上映。而上海的电影市场占据了 Hollywood 电影在中国的绝对份额,1933 年的统计显示,上海 37 家影院中有 19 家主要放映美国片,整个 30 年代,上海上映的影片约有 80% 是美国片。一些档次较高的影院,基本上以放映美国片为主,如大光明电影院在 1933 年至 1942 年的十年间,仅放映过一部中国电影,其余全部是美国片。这已不是正常的文化交流,而完全是单向的文化倾销。

不可否认,电影的时尚性、娱乐性和大众化群体欣赏方式,受到了上海市民的喜爱,使之成为城市生活休闲消遣的首选。美国电影的叙事美学,如奢华铺张的场景、悲欢离合的情节、高超的表导演艺术和摄影技巧,以及结尾渲染的“永恒幸福”“邪不压正”等主题,都契合了上海市民的欣赏心理。^①

^①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3 页。

在观影群体中,不仅有富家子女、普通市民,也有文化名人,如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载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观看了 100 多部影片,虽然先生更喜爱苏联电影,但如此庞大的观影数量,其中美国电影当不在少数。女作家张爱玲也是电影迷,好莱坞的世俗趣味对这位擅长描摹悲欢得失的女子有着一种亲切意味。由此,美国电影中的审美观念、时尚元素以至服饰发型、爵士音乐、交谊形式等流行文化,渗透到上海社会从上流阶层到市井平民的生活之中,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上海时尚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上海市民的文艺欣赏品格,以及追求新奇、崇尚“洋派”的城市文化习俗。

中国的民族电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长出来的,其生存空间几乎被占领银幕的美国电影挤压得毫无间隙。然而,如此严酷的现实没有磨灭中国早期电影人矢志要创造自己民族电影的意志。这一意志,来自于对自己国家文化的信心与责任。以中国动画电影的开创者万籁鸣四兄弟为例,他们有感于当时银幕上给中国儿童看的尽是从好莱坞舶来的米老鼠、黑猫、蜜司蓓蒂蒲之类的卡通角色,立志要发掘中国人自己的幽默,为孩子们提供自己民族的卡通人物。经过多年的曲折,他们终于在 1940 年实现了这一夙愿,在上海创作完成了根据《西游记》改编的中国及亚洲第一部有声动画大片《铁扇公主》,胶片长达八千余英尺。万籁鸣四兄弟的这种决心和努力,正是中国早期电影人的共同写照。

中国电影人首先是虚心向美国电影学习制作技术和叙事模式。夏衍曾回忆:“我们开始搞电影,是从看外国电影学起的,当时看的电影大多数是美国的。没有书,没有学校,就是到上海大戏院去看,手里拿个小手电,边看电影,边计算时间,几英尺、几英尺地计算。就这样,学了点电影的手法和技巧。”^①

^① 李亦中:《电影国门几度春秋》,艺术交流网,<http://www.cflac.org.cn/>,2009-04-21。

秦怡在接受采访时也说,“上海电影一直都是有意向好莱坞学习的。这种学习首先是视觉效果上的”,“另外就是明星制,当时胡蝶啊什么的做派、气质完全都是好莱坞巨星式的”。^① 充斥着好莱坞影片的银幕,成了中国电影人的学堂,培育了中国早期的电影人才,最终孕育出中国自己的民族电影,这恐怕是美国片商无法想象的。但上海最早出品的一批中国电影,也因此明显带上了模仿美国影片的痕迹。如上海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 1920 年出品的第一部武侠电影《车中盗》,剧情来自美国侦探小说《焦头烂额》中的一章,诸如此类将美国作品改头换面组合为新故事搬上银幕的还有不少。1934 年由留美归来的导演孙瑜拍摄的代表作《大路》,结尾处主人公在想象中再生,让人直接联想到好莱坞影片《西线无战事》的结尾。除了学习模仿好莱坞电影的叙事结构,还追随其影片的类型取向。如 1937 年当美国经典恐怖片热映后,上海新华影业公司也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恐怖片《夜半歌声》;好莱坞歌舞片《出水芙蓉》《百老汇的旋律》风靡一时后,上海电影业又开始发掘本土的歌唱题材影片。

也许,在中国电影起步之初,这样的蹒跚学步是无法避免的阶段,然而中国电影人很快意识到,“要挑战乃至取代好莱坞的支配性存在,中国电影业就必须在内容和形式上开掘民族文化资源、发展出自身的影像语法和词汇”。^② 他们为此开始了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践。一方面,在电影创作中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题材,演绎国人尤其是生活在底层的芸芸众生的情感和生活,反映民众疾苦;另一方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美学营养,用以丰

^① 《上海老电影人秦怡、吴贻弓专访》,http://ent.sina.com.cn,《新京报》2004 年 6 月 10 日。

^② 孙绍谊、晓同:《上世纪 30 年代美苏电影在上海》,《申江服务导报》2011 年 7 月。

富电影的表现能力,营造本土特色。值得指出的是,由进步文化人组成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一直是左翼文化阵营的成员。1930 年 3 月和 1931 年 1 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先后在上海成立,中国电影人对民族电影发展的自觉意识与国家的危亡、民族的救亡紧紧结合在一起,将电影的思想性、社会性和战斗精神推向了高峰,一批深受观众欢迎的本土精品应运而生。1934 年,由吴永刚导演、阮玲玉主演的电影《神女》,不仅故事来自现实生活,而且以含蓄、幽远、恬淡的风格,承继了中国古典艺术的风韵,至今仍被国内外影坛评为经典之作。同样,1935 年由蔡楚生导演的《新女性》,题材也来自现实生活,而且在嬉笑怒骂的幽默中含有中国戏曲的传统元素。1934 年拍摄的《渔光曲》和 1937 年拍摄的《马路天使》,都体现了精致、简洁、清新的艺术个性,表现出鲜明的民族风格。中国民族电影产业终于在不懈的努力和实践中聚集了一支有才干、有作为的队伍,出现了联华影业公司、明星影片公司这样在美国电影的冲击下始终挺立中流,能够源源不断地制作精良的本土题材影片的专业机构,从而冲开好莱坞电影的巨石压迫,以自己的活力与风貌展现在世界面前。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由此开启,在它的丰碑上,镌刻着一连串优秀影片的名字。

回顾这段历史,上海所代表的中国电影业从发端开始,即是美国文化和本土文化交融的产物,在这种交融过程中出现的盲从与觉醒、学习与创造,进而逐步走向成熟,自成一体,脱颖而出,其实体现了文化发展的规律。没有早期电影人所坚持的独立品格,就没有中国民族电影的今天。如今全球趋向一体化,交流的大门从未如此敞开,各种域外文化纷至沓来,冲撞着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文化传统不断发生裂变,置身这样的时代,反思和发扬前辈知识精英在当年所坚守的民族立场、独立品格,显得尤为重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前辈知识精英告诉我们,文化只有在世界的交流交融中才

能发展,文化也只有在自我的创造中才能强大起来,得到别人的尊重。

三

面向开放的世界,抱着与时俱进和有容乃大的态度,不断引进移植域外新的文化艺术样式,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使之能够生根开花,丰富充实自己城市及自己国家的文化艺术,这是在一百七十多年的沪美文化交往交流中,上海的前辈精英留给我们的同样重要的启示。或许他们没有今人总结的思想认识高度,但确实是这么做的。

上海是一座文化艺术多元多样多彩的城市,仅以文艺样式的种类来说,文学、戏剧、音乐、电影、美术、摄影、舞蹈、杂技、魔术、工艺等俱全,而且历经动乱变迁,都基本留存至今,有着完整的体系,这是很难得的,在国内外的大城市中也属少见。在这些文艺样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随着 19 世纪后半叶的西风东渐,从西方引进的,其中一些品种如交响乐、芭蕾舞等,从上海走向了全国。而美国的文化艺术,是新兴文艺样式引入上海的一大来源。

人是文化的载体,1843 年后的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由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侨民、商人、教师等与中国的知识界精英共同完成的,在中国的这些精英中,又有不少人是从海外留学归来,云集上海,他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的文化艺术有着几乎天然的接受态度,热忱地将新颖的文艺品种介绍到中国来,并身体力行,积极推广和进行本土化的移植实践。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流行音乐在中国的出现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其最早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在清末成书的《清稗类钞》和 1884 年至 1898 年出版的《点石斋画报》中,记载了美国人在上海的音乐活动。在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圣约翰书院和中西女子中学里,都设有西方音乐和西洋乐器的教学课程,然

而传播范围有限,并不具备广泛的社会性。真正将西方音乐引入中国学校的美育,并孕育了雏形的中国流行音乐的,是两位留日归来的前辈沈心工和李叔同。1905 年,科举制度在中国废除,各地纷纷兴办新式学堂取代旧式私塾,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美育受到广泛重视,新的音乐教育形式——教学生在课堂上集体演唱的“学堂乐歌”应运而生。当时的“学堂乐歌”大多选择欧美的歌曲曲调,填入中国内容的歌词,其中采纳了不少美国歌曲。如李叔同填词配曲的著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曲调源自盛行于 19 世纪后期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经过李叔同填入极富中国意境的歌词,以幽远委婉的韵味流传至今。在李叔同一生创作的五十余首“学堂乐歌”中,采用美国歌曲曲调的相当多,还有《隋堤柳》《光福之柏》《友谊》《忆儿时》《梦》《春晓》《送旧年》等。沈心工在 1912 年编辑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一书^①,其中《勉学》根据美国歌曲《罗萨·李》的曲调重新填词。“学堂乐歌”的创作与推广,使合唱这一种“集体歌唱”的文艺新样式引入中国,可以说是孵化了中国流行音乐最初始的形态,堪称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个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学堂乐歌”的兴起切合了清末民初图新思变的时代大潮,熏陶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代年轻新人。

流行音乐真正作为一种商业娱乐文化在上海兴起,是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彼时,上海城市的演变发展造就了热衷于追随时尚生活的庞大市民阶层,唱片业的兴盛和广播电台的大量出现又形成了成熟的商业与传播机制。1930 年之后,上海出现了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华商大中华唱片厂及美商胜利唱片公司三大巨头,成为全国的唱片制作和发行中心。据《上

^① 沈心工:《重编学校唱歌集》,共 6 集,上海文明书局 1912 年版。

海广播电视志》记载,这三大公司在 1949 年之前共出版了各种牌号的粗纹唱片八千余种,数量达数百万张,民办电台则超过两百家。而作为外来的推动,美国文化对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 世纪初,在经济发展而生活富足的美国,流行音乐作为市民阶层的新文化代表崛起,布鲁斯、爵士乐、摇滚乐、蓝调和乡村音乐等通俗、新颖、强烈的大众音乐先后风行,成为西方流行音乐的主体,并来到上海,通过舞厅、电影、广播等媒介,如鱼得水地迅速在这座商业化的东方都市生长起来。活跃在上海的中国音乐人则从美国流行音乐中吸收了从形态、风格到内容的大量元素,进行自己的流行音乐创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黎锦晖。1927 年他在上海创建了中华歌舞团,1929 年改建为明月歌剧团,这事实上促成了中国流行音乐最初的两次人才队伍聚集,这其中既有王人美、黎莉莉、白虹、周璇这样的明星,也有聂耳这样的进步音乐家。黎锦晖的流行音乐创作吸收了两方面的元素:一是美国流行音乐尤其是舞曲和爵士乐的风格,从节奏到配器都进行了模仿;二是中国民歌、小调、曲牌等民间素材,从而奠定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基本风格,即中国民间旋律与西洋舞曲节奏的结合。在歌词创作上,中国流行歌曲继承发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修养,至今我们听到的《四季歌》《秋水伊人》等歌曲,都相当富于中国气韵和文学特色。

早期中国流行音乐在处理外来形式与民族传统的关系上取得了极大成功,加上它所具有的通俗性和大众化的特点,很快吸引了进步文化人的参与,并且与中国自己的电影结合起来。聂耳、田汉、贺绿汀等进步人士都加入到流行歌曲的创作,写出了一首又一首激励民众奋起、投入民族解放的歌曲,其中包括聂耳谱曲的电影歌曲《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亿万同胞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定为国歌。现今这些歌曲的性质被认为是革命歌曲,其实从其创作的初衷和传播的方式来看,与流行音乐有密切的渊源,列入流行音乐的范畴是恰当的。

许多人不知道,上海地方戏曲沪剧的命名诞生,也是引进移植美国文化促成的一件佳事。沪剧的历史较短,它起源于上海浦东的民歌东乡调,在清末演变为上海滩簧,1914 年改名为申曲。1927 年之后,申曲从说唱发展为借鉴文明戏(即话剧)形式演出有头有尾情节的完整剧目,逐渐衍化为一种地方戏曲,但仍没有正式的剧种名称。1940 年 5 月,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魂断蓝桥》上映,当年 11 月即登上了中国的银幕,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美国本土。其原因,一是影片由费雯丽和罗伯特·泰勒两大男女明星主演,而费雯丽在主演《乱世佳人》名声大噪后,这是其接拍的第一部电影;二是影片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故事,赞颂对爱情的忠贞,十分契合中国观众的伦理传统。在中国上映后短短数月,善于广采博取的上海文艺界争相将它改编为其他样式,有早期越剧名小生李艳芳主演的越剧版《魂断蓝桥》,有艺华影业公司由梅阡导演、李丽华和郑君里等人出演的中国版电影《魂断蓝桥》,1941 年 1 月,则出现了沪剧版《魂断蓝桥》。

在沪剧的发展历史上,广泛吸收各种新的戏剧元素和演出俗称为“西装旗袍戏”的现代剧目是两大特点,改编美国电影《魂断蓝桥》正好符合这两大特点。考虑到再称为申曲已不符合剧种现状,而上海简称“沪”,于是新成立的申曲剧社定名为“上海沪剧社”,《魂断蓝桥》就成了以“沪剧”之名演出的第一部戏。事实上,这次演出不仅仅是改变了一下剧种名称,它对沪剧艺术本身进行了一次深刻的改革。沪剧《魂断蓝桥》在内容上采用了美国原版电影的框架,在形式上吸取了话剧和电影的表现手法,对舞台各个部门提出

了新的标准,要求做到导演电影化、剧本话剧化、表演艺术化、唱词申曲化、布景写实化、灯光科学化、道具美术化、服装时代化、效果真实化等,还首次采用剧本制,取代过去惯用的只有剧情大纲的幕表制。这就意味着,从这个戏开始,沪剧从内容到表演都从申曲中脱颖而出,走上了综合艺术的道路。这在沪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1 年 1 月 9 日,沪剧《魂断蓝桥》在上海皇后剧院正式公演,由严幼祥导演,解洪元、王雅琴分饰男女主角罗伊和玛拉,由于演出形式与传统的申曲相比焕然一新,获得了很大成功。至今,《魂断蓝桥》仍是沪剧的经典保留剧目,不断在舞台上复演。美国文艺作品在上海得到本土化的移植与改造,最终促成上海一个本地剧种的诞生,这是上世纪 40 年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一个难能可贵的结晶。

一百七十多年来,正是在不断吸收包括美国文化在内的世界优秀文化、先进艺术、新颖样式的过程中,形成了今日上海城市文化多元多姿的格局,也铸就了上海城市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包容并蓄的海派性格。今天,“这个城市正在回归它的历史角色——它是重要的汇合点,是世界看中国、中国看世界的窗口,也是东方遇见西方、认知自我的地方”。“上海正在迎接未来独一无二的挑战。它在日新月异变化着的同时,也在重审自我,要把中西合璧的历史背景融入到万象更新的 21 世纪的城市愿景中去。上海既有本土特色,又具国际风范,所有那些意图在全球化进程中保住本地特质的城市,都会对上海产生兴趣和共鸣。”^①时代向上海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希望它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既能为海内外的优秀文化提供尽情施展的舞台,又能保持和激活自己的城市特质和创新能力,从而为世界作出表率,甚至成为 21

^① [英]凯利·布朗(Kerry Brown):《上海 2020——西方学者观照中的上海与中国》,外文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 页。凯利·布朗为汉学家、外交家。

世纪新的世界中心城市。在这样的时刻,重温上海的前辈知识精英走出的不平凡道路,学习他们的宽广胸怀、卓越才识、独立品格和创造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特别现实的意义。

谨以此文向上海的前辈知识精英致敬。

沪美体育文化交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纽带与桥梁

肖焕禹 倪京帅

[内容提要] 在中美交流史上,源远流长的两国体育交流是最为频繁、富有活力的国际文化交流,而早期的沪美体育交流揭开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崭新一页。近代沪美体育传播的兴起肇始于美侨的人际传播;基督教青年会、美国教会学校等组织传播美国体育文化,报纸和期刊等平面媒体促进美国体育文化在近代上海的大众传播。现代沪美体育交流开启于中美乒乓外交的上海之行,中美建交后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迎来了沪美体育交流的升温期,赛事交流彰显了沪美体育交流的良好态势,体育精英引领了沪美体育交流的新发展。从沪美体育交流的历史进程来看,中美体育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建设体育强国,树立共赢、平等、尊重的健康发展理念;构建东方体育文化的话语体系,主动将东方体育文化向美国传播;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根据中美两国国情,加强公共体育外交建设,通过体育文化交流使民间相互了解,形成文化认同;加强两国体育文化教育研究,汲取体育文化精华,取长补短,使两国人民共享体

育,建立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

[关键词] 美国 体育文化交流 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关系

[作者简介] 肖焕禹,上海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倪京帅,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体育部博士。

在中国历史上,上海一直是世界关注的中心之一。在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看来:“上海是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西方和中华文明接触的结果在中国的反映,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①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埠,成为西方文化传入及中西交融的中心,也成为了美国使领馆、银行、学校以及侨民的最早登陆地,正式开启沪美交流的历史。在沪美交流的一个半世纪中,无论是商业交往还是文化交流,都映射出了“文明是相互流动、相互学习”的人类发展基本理念。沪美交流史上,在现代化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体育,一直在沪美文化交流中充当急先锋角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沪美体育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

伴随着美国侨民的络绎而来以及租界的建设和发展,美国生活方式也逐渐被带到了上海租界,包括竞技体育、戏剧表演、露天音乐等文化活动开始自然地融入到租界生活中,让上海民众感受到了一种异样文明形态。租界中开展的各种体育活动,美侨是积极的参与者与传播者,其通过人际沟通传播美国流行的运动项目,通过体育组织向国人展现有序的管理方式。运动成为美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开辟了近代体育在上海乃至中国的传

^① 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播先河。

19世纪50—60年代上海的美侨就已开展诸如室内保龄球、跑马、划船、板球、国际象棋等休闲体育类项目。到19世纪末上海美侨社会开展的体育项目,还包括草地滚球、高尔夫球、网球、曲棍球、棒球、体操和游泳等。这个时期,几大美国主流体育项目也都开始传入上海。田径运动传入上海是在19世纪下半叶,最初是作为游戏活动出现在租界侨民中,在租界有万国运动会、万国越野跑、万国竞走赛等田径比赛;棒球运动是美国的“国球”,1876年以前棒球即由美侨带入开展于英美租界,自1876年起每年夏季在跑马场举行棒球比赛,直接带动近代上海棒球运动的开展;美式足球(橄榄球)被称为美国第一运动,20世纪20年代上海美童公学开展橄榄球运动,美童公学与盐城淮美学校每年冬季进行校际比赛。可以说通过美侨自觉和不自觉地参与和传播,当时欧美社会流行的大多数体育项目都已在上海美侨社会中出现。

在近代上海租界中,美国人成立或参与的体育组织有板球总会、棒球总会、划船总会、草地滚球总会、游泳总会等,这些组织一般都有会所和运动场地,其中尤以美国总会最为知名。这些美式体育组织最初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在租界,但很快具有了功利的性质,除了有娱乐、锻炼的目的外,就是作为扩大社交及商业周旋的基地,甚至可以作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这些体育组织开始局限于租界侨民体育活动,后来逐渐向社会传播,促进了早期近代体育的传播。在中美交流史上,源远流长的两国体育交流是最为频繁、富有活力的国际文化交流,而早期的沪美体育交流揭开了中美文化交流的崭新一页。^①

^① 倪京帅:《中美体育交流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体育学院,2014年,第2页。

二、近代沪美体育文化传播内容及影响

(一) 近代沪美体育文化传播内容

1. 美国传教士东来上海

让人们掌握体育知识、完成体育运动技术需要依靠人际传播,体育人际传播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体育领袖。从来中国推行西方流行体育项目的上海青年会第一任体育干事艾克斯纳博士,到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来华体育家中之贡献最大”的麦克乐;从“中华创始之举”上海留美幼童的美国体育经历,到自觉向美国取经的上海体育先驱,体育领袖异常活跃,在沪美体育交流中发挥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美国体育在近代上海的传播中,体育领袖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来华的传教士和中国留美学生。麦克乐在沪宁一带演说,举办演讲会,宣传西方体育思想;在艾克斯纳的倡导下,基督教青年会举办了体育干事训练班,培育近代中国早期的体育人才;举办了各种业余体育培训班和业余体育比赛,促进了大众体育的开展和普及;介绍了美国自然体育思想,举办体育卫生讲座,进行体能测验,促进了近代中国体育的科学化;发起和举办了民国全国运动会,为推动我国近代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①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中国有大批留学生远赴欧美学习。在赴美归国的留学生中为我国的体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与上海有关的代表人物,有中国体育活动家沈嗣良、圣约翰大学的杰出毕业生马约翰、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女教育家和女体育家陈英梅、中国第一位女体育博士张汇兰。

^① 倪京帅:《中美体育交流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体育学院,2014年,第52页。

2.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传播西方组织文化

基督教青年会 1844 年在英国成立,后在美国得到蓬勃发展。由于基督教青年会倡导“四育”的青年培养体系,因此它又是社会教育组织。基督教青年会十分重视发展体育运动,把发展体育事业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日常工作。^① 1876 年传入中国后,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组织。青年会通过完善有序的组织系统来推进各项工作,为近代上海提供了一个组织化的范本。青年会有严密的组织系统,系统分部明确,共有十二部,体育部是其中一部,主要负责组织系统中的体育工作事宜。基督教青年会对于体育的提倡,并不仅仅局限于会员,而是以整体的社会群众为对象,对近代上海乃至中国体育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08 年上海青年会体育部成立以后,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体育组织机构,为近代上海体育发展做了大量首创性的工作。主要表现在:(1) 为近代上海引进了美国流行的球类体育项目,体育部成立后,聘美国人艾克斯纳任体育部主任,开设体育训练班,分别将篮球和排球作为教学内容传授,成为近代上海社会开展最普遍,也是最受欢迎的运动项目。(2) 介绍了美国自然体育思想。自然体育思想是 19 世纪末在美国形成的比较系统的体育理论和方法,经艾克斯纳和麦克乐等人以及青年会干事的传播,深入到各个阶层的民众。(3) 培养了一批体育师资人才,通过开办体育干事培训班和女青年会体育师范学校,为上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体育人才,如吴蕴瑞、马约翰等。(4) 举办了各种竞技体育赛事和大众体育赛事,由青年会体育部发起和主办的单项比赛和联赛、筹办的全国性运动会,使近代上海体育向社会化、组织化方向发展。

^①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01 页。

在青年会体育部等体育组织影响下,1924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建立,使中国人开始直接参与到中国的体育传播活动中,慢慢从西方人手中夺回体育传播的主动权。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以后,各种民间体育团体相继成立,在足球、网球、篮球、排球、垒球、田径、体操等各个近代竞技体育领域开展了群众性的宣传、组织训练和各种比赛活动,极大地推进了近代上海社会体育运动的迅速发展。^①

3. 美国教会学校传播现代体育教育思想

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认为,“教育近代化是整个社会近代化的重要部分,是社会近代化的起点和标尺之一”。19世纪末,正值美国教会掀起国外传教的热潮。一大批受过大学教育的传教士纷纷来华。这样到1898年,美国教会在中国已开办1032所初等学校、74所中等以上学校。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有小学、中学和大学。美国体育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中,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传教士来华办理的教会学校,沟通了中西文化,传播了西方教育,同时也带来了西方体育,教会学校为西方体育进入中国起到了桥梁作用。因此,有学者指出“体育进入教育,最早的契机在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的载体是基督教教育与青年会”。随着基督教学校的进入,西方体育在上海教育中扎根,体育作为教学内容出现在教会学校教育中,教会学校成为美国体育传入上海重要的交叉点。^②

美国教会教育机构的创办,沿着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路径开展起来,沟通了中西文化,传播了西方教育,同时也带来了美国的体育教育思想。在上海的美国基督教学校对美国体育的教育和植根,是美国体育在近代上海传播中

^① 倪京帅:《中美体育交流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体育学院,2014年,第56页。

^② 倪京帅:《中美体育交流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体育学院,2014年,第44页。

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教会学校大都从自由平等的教育理论出发,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美国教会幼稚园设置游戏课程,教会小学把体操列为课程范畴。由傅兰雅在上海开始的盲童学校,注重对特殊儿童的体能和技能训练;基督教女校,如“中西”“晏摩氏”“圣玛利亚”普遍开设体育课程,课余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早在19世纪中期传教士就已经在上海开设新式学堂,20世纪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上海相继创立了圣约翰、沪江和震旦大学等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是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教会大学,教会大学体育活动均开展得有声有色,颇有成效。1890年5月,圣约翰书院田径运动会开创了近代中国运动会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美国教会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体育社团、体育师资、体育竞赛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现代体育教育的某些特征和发展理念,体育教育已经渗透在了教会大学的每个层面,美国教会学校自始至终都是近代体育活动最为重要的传播基地,为近代上海体育的演进做出了先导和示范。

4. 大众传播促进美国体育在近代上海的启蒙与普及

上海开埠以后,以报纸、期刊和书籍等为代表的纸媒的兴起,在为人们传递日常生活信息、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到了民国时期,大众传播开始成为上海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海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大众传播,主要有报纸、杂志等方面,以反映上海普通大众生活的《申报》对美国体育的报道最多,也最为系统,其中《申报》对于美国体育的报道主要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最主要的方式,即体育附在教育、社会等其他相关报道之中;第二种是报纸开设体育专栏。关于美国体育的报道也主要集中在这两种方式中。^① 近代上海的体

^① 倪京帅、林恬、张业安:《近代上海平面媒体报道美国体育的作用:引导·启蒙·示范》,《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第205—208页。

育期刊有 60 余种,包括早期的《体育界》《体育杂志》2 本体育刊物;20 世纪 20 年代出版的反映精英思想的《东方杂志》《体育世界》《体育月报》等,对于美国体育在上海的传播和推广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面以一则“美国大比武之结果”体育新闻为例进行分析。

二十九日伦敦电云,杰克与杰弗里斯在美国里伐达省里洛地方比较拳术,战至十五回合杰弗里斯力不能支,即为杰克击倒,所赌之疑已增至美金洋十二万一千元,负者得百分之四十,其余尽归胜者。原议负者仅得百分之二十五,后从环生之意改为此数。

三十日伦敦电云,据纽约者称环生既胜杰弗里斯后,各处掀起排拒黑人之暴动(因杰克系黑人故)黑人受伤者已有二十人,登时殒命者一人。

又电云美国种族暴动势颇激烈,因此殒命者已有十三人大半系属黑人,受重伤者数百人,地方官已召兵队出而镇压暴动之人,为数颇众,纽约一处死者共有五十人,该处乱民均自由使刀枪毫无忌惮,各报均著论斥之,并要求禁止比武之举。^①

1910 年 7 月 8 日,《申报》以“美国大比武之结果”为题连续报道了美国著名的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赛,杰克-约翰逊对阵吉姆-杰弗里斯的比赛。在比赛的第十五回合中,杰克将杰弗里斯打倒,比赛结束后,美国各地爆发了激烈的种族骚乱。从报道内容来看,《申报》既报道拳击比赛结果,也对由此引发的美国种族骚乱进行了跟进报道,使民众在关注赛事报道的同时,对

^① 肖鸿波:《〈申报〉77 年体育报道研究(1872—1949)》,复旦大学,2011 年,第 85 页。

于美国的社会状况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在赛事报道中关注社会热点问题,成为此后《申报》报道的常态。

美人运动之方法更有三十余利,均足以为长养之助。利于其劳力之中,使其劳力时无难苦之感。大足为华人借学者也。中国需要运动之情势,实有非可书者。良以中国男女儿童,往往劳逸不均,故必须时作运动以矫除之。身体既经训练自必强健,国民体格既强,国势亦可因而强盛,强壮而活泼之国民自能征服彼等抵抗力薄弱之国家也。美国现时盛行之绝无损害之游戏及运动,实能造成强壮之少年中国,其功效之伟大,胜过以干燥无味之书籍,使儿童诵读之。何以此等游戏及运动。

在报道美国体育的发展情况以后,《申报》还试图回答“中国体育到底该如何走”的问题,在1924年6月20日标题为“华人应探取美国之运动法”的报道中指出“国民体格强健,国势亦可强盛”“美国盛行的游戏及运动,能够造就强壮的少年中国”,反映了作者熟悉美国体育发展的基本情况,希望通过学习美国体育改变中国积弱成疾的现状。

(二) 近代沪美体育文化传播的影响

1. 美国体育生活方式对上海民众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体育在上海首先是以一种生活方式出现的,西方侨民的到来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中就包含着体育生活。美侨在租界的生活方式,使近代体育以休闲娱乐的方式呈现在国人面前,并以竞赛为主要载体传播和渗透到国人中。此后,基督教青年会、美国教会学校等把体育的概念、运动组织形式以及现代竞技体育运动的经营管理方式传播到上海,对近代

中国体育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美侨所进行的体育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念和精神,而是与娱乐方式、人际关系、城市建设、商业发展等密不可分,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体育组织成为美侨社交、商业周旋的重要基地,向国人展现了一种有序的管理方式;美侨参与租界体育场所的建设,是西方物质文明的一种示范,为近代上海的城市建设奠定了基础。^①

2. 美国体育教育促进了近代上海教育的发展

体育进入教育,最早的契机在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的载体是基督教学校。随着美国基督教学校的发展,体育运动被列入了上海教会学校的正式课程,教会大学成为体育活动最重要的传播基地。同时,近代体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潜移默化中让青少年接受了美国文化和美国文明。通过美国教育和美国体育的传入,沟通了一条沪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美国传教士在传播美国文化时,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熏陶,而选派教会学校中的中国体育学生到美国留学,利用美国教会大学为上海,乃至中国培养了体育领袖人才。通过沪美体育文化的融通和交流,促使上海教育更加完整、完备和完善,使学生更趋于全面发展,使教育制度趋于合理和客观。^②

3. 美国体育文化是塑造上海海派文化城市的重要因素

海派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核心,历史上来自世界和全国各地的移民,带着自己的文化烙印来到上海,造就了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精神。从历史上看,上海一直都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自然使得上海成为中国与外部

① 倪京帅:《中美体育交流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体育学院,2014年,第59页。

② 倪京帅:《中美体育交流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体育学院,2014年,第54页。

世界,甚至是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点。美式体育作为一种美国的文化符号,反映了美国人的性格特征、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它的传入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引进和文化的交流。美式体育项目在租界内出现进而开始流行,为上海民众认识并接受;早期体育竞赛中上海民众观赛参与,对于上海竞技运动起到启蒙作用;美式体育组织有序的管理方式,日后成为华界体育组织的基本模式,以上内容都反映出在被动和主动接受美式体育文化过程中,海派体育文化也有意或无意地融入了上海的城市文化,体现了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精神,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近代上海的海派文化城市的个性。

4. 近代沪美体育传播的负面影响

美国来华传教士为了达到“为基督征服世界”的目的,开办各类学校,开展各种学校内部和社会方面的教育体育活动,以吸引青少年在学习和娱乐的同时,接受美国文化观念。因此,美国体育在近代上海的传播是伴随基督教的传入而自觉和不自觉地进行的。宗教传入的同时,一方面,带来了西方的新式体育,美国教会学校和教会组织为中国培养的诸多体育人才,对我国体育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体育传入的历程,毕竟反映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侵略,由于西方体育文化在上海和全国的传播及发展,使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受到很大冲击,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引发了一场“土体育”与“洋体育”的争论,最后的结论是:以西方体育为主,以传统体育为辅,推动中西方体育发展。

三、现代沪美体育交流的内容

(一) 中美乒乓外交的上海之行

1. 日本乒协的破冰之请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于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举行。鉴于中国乒

乒乓球运动技术水平享有的良好声誉,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亚洲乒乓球联合会会长后藤钾二等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队参加此次世乒赛,比赛就会失去世界锦标赛的意义,不具有代表性,于是他本人专程到中国登门邀请中国队参赛。由于当时我国与许多国家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加重了当时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出于想借助这届世乒赛的机会打开国际交往的新局面,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乒乓球队在出师此届世乒赛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乒乓球队队员时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导方针。正是在这一指导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乒乓球队在这届世乒赛上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促成“小球转动地球”的佳话。世乒赛结束后,中美两国乒乓球队实现互访,打破两国二十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中美关系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2. 巴士车上见证中美友好的源点

在名古屋世乒赛时,发生了庄则栋在车上相遇美国运动员科恩的故事。根据徐寅生先生的口述,“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在训练结束后正要登上汽车,赶往比赛场地。这是一辆旅馆与比赛场地之间运转的专车,车上还有警察和陪同等。美国嬉皮士运动员科恩看到有车,就稀里糊涂上来了。中国队出发前,总理就说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也没说要跟美国人怎么样。所以当美国运动员科恩上来后,大家也没有感到很特别,很惊讶,不是说美国人怎么能上我们的车啦,或者很紧张,或者很兴奋,等等。科恩上来坐就坐,也没去理会他。庄则栋一看美国人上了中国队的车,也没人理他,就上去跟他套套近乎。他跟科恩比划比划,还赠送科恩一块织锦的纪念品。大家都认为是很正常的,没想到这个场面被新闻记者报道出去,引起了各方注意。难能可贵的是:别人没有去做,而庄则栋却主动去做了。庄则栋是在特定的

场合下,做了看似平常,但产生很大效应的一件事”。^①

庄则栋伸出的友谊之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美国乒乓球队副领队哈里森向中国乒乓球协会提出访问中国的意向。中国代表团随即向国内请示,在获准的情况下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一爆炸性的新闻在名古屋宣布后,立即震动了全世界。消息的影响力超过这届世乒赛本身。美国乒乓球队接到邀请后,欣喜万分。他们在得到美国国内批准后,比赛结束便从名古屋取道东京,前往中国北京后到达上海。

3. 美国乒乓球队的上海之行

“乒乓外交”开启了现代中美体育交流的大门,在这其中上海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1971年4月,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杰克·霍华德、朱迪·博琴斯基、乔治·布雷斯韦特和蒂姆·博根等运动员共15人组成的美国乒乓球队,在应邀访华期间至上海参观访问并进行友谊比赛。

表1 美国乒乓球队赴上海代表团名单

代表团职务	姓名	职务
团长	格雷厄姆·斯廷霍文	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
副团长	拉福德·哈里森	美国乒乓球协会国际委员会主席
其他负责人	蒂姆·博根	美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
	乔治·布本	美国参加国际乒乓球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
领队	杰克·霍华德	
男运动员	约翰·坦纳希尔、埃罗尔·雷塞克、洛伦·科恩、乔治·布雷斯韦特	
女运动员	康尼·斯威里斯、朱迪·博琴斯基、奥尔加·索尔特斯	
随行人员	布本夫人、雷塞克夫人和迪克·迈尔斯(记者)	

^① 徐寅生口述,金大陆采写,吴维整理:《我所亲历的中美乒乓外交》,《新民晚报》,2017年2月27日。

4月15日,美国乒乓球队抵沪当晚7时,在江湾体育馆与上海乒乓球队进行了友谊比赛。当晚沪美双方出场的名单如下:

男子团体赛出场名单:李振侍、姚振绪、张孚璇

对抗名单:吴新民、余永年

女子团体采用男团赛打九局

出场名单:林福妹、徐若伟、丁赛珍

对抗名单:王丹华、王莲芳

采用打五局团体出场名单:林福妹、徐若伟

对抗名单:丁赛珍(王丹华、王莲芳后补)^①

美国乒乓球队抵达上海后,除了进行乒乓球友谊比赛之外,还到上海外滩、上海豫园、上海动物园、上海的人民公社等地参观考察。1971年4月17日,美国乒乓球队愉快地启程返美。回到美国后,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哈里森致函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他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斯廷霍文团长和全体团员,感谢上海对他们的热情接待,并表示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在上海所结成的新的友谊,希望双方不久能在美国或中国再次相见”。1972年4月,由上海运动员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郑怀颖等上海乒乓球界的精英为主力队员组成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对美国进行了回访。

“乒乓外交”传递了中美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理想与信念,更是打破了两国之间长达22年的隔绝状态,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姿态。美

^① 资料来源:上海档案馆。

国《时代周刊》曾发表评论指出:“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①小球转动了地球,乒乓外交带来了中美两国运动员的互访,促成了《中美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的诞生。同时,中美乒乓外交对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带来了巨大的促进,1971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乒乓外交之后,英国、日本、希腊、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纷纷与我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我国体育界也在这一时期积极重返国际体育组织,而这一切都与“乒乓外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 中美建交迎来沪美体育交流的升温期

“乒乓外交”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两国经贸交流还未开始之前,体育成为中美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和促进两国关系的重要途径。中美两国逐渐恢复体育交往后,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城市之一,也是海外最知名和认可度最高的著名城市,自然成为中外体育交往的汇聚地。“乒乓外交”之后,美国的体育代表团相继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一些重要的国际体育比赛,沪美之间的体育交往逐渐升温。1975年5月美国田径队90人来上海访问交流,并与上海田径队进行了友谊赛,跳高教练坦斯利在上海停留期间还进行了讲学,分析了背越式跳高技术。1977年由巴西球王贝利率领的美国纽约宇宙足球队访沪,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和中国国家足球队进行了友谊赛,最终中国队以2比1战胜对手。次年,中国队应邀回访美国,两队在旧金山赛成平手。1980年美国运动员来沪参加上海国际举重邀请赛。1981年和1983年美国两次来沪参加上海国际桥牌邀请赛。1985年5月美国拳王阿里来华,在上海期间参观了上海精武体育会并在上海体育学院和“南拳王”周士彬举行了表演赛。可以说,沪美体育交流的兴

^① 崔乐泉:《奥林匹克运动会简明百科》,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83页。

起开启了当代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态势。

中美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建立后中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构成了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后的十年间,中美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十分迅速的发展。我国的体育也逐步与世界体育相融合:按照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建立我国的体育组织、完善运动竞赛体制,使国内赛事与国外赛事相互接轨,促进了我国体育的国际化发展;加强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积极参加国际体育科学大会;加强奥运知识的普及;全面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交流;积极承办各类体育赛事与国际体育会议等。^①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的体育对外交往全面开启,两国关系的快速发展也迎来了沪美体育交流的升温期。沪美之间的体育交往对促进中美关系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赛事交流彰显了沪美体育交流的良好态势

体育赛事是沪美体育交流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包括奥运会、世锦赛、上海品牌赛事等的交流。(1) 奥运会是沪美体育赛事交流的重要场合。1984年美国洛杉矶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共派出225人运动员参赛,其中上海运动员27人。在本届奥运会上,曾三破世界纪录的上海著名跳高名将朱建华在男子跳高比赛中获得铜牌,这也是亚洲运动员在该届奥运会田径比赛中获取的唯一一枚奖牌。周晓兰助阵中国女排勇夺奥运会金牌,“神马手”李小平与队友合作获团体亚军。1996年夏季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时逢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辰100周年。中国代表团共495人,其中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438页。

运动员 309 人(女运动员 199 人),包括上海运动员 26 人,男子运动员 8 人、女子运动员 18 人。上海籍游泳运动员乐静宜勇夺女子百米自由泳金牌。女足运动员孙雯、水庆霞、谢慧琳等都有出色表现。第 29 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 2008 年在中国北京开幕。上海共有 66 名运动员、121 名裁判员、19 名教练员参加本届奥运会。开幕式入场式上由上海篮球运动员姚明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奥运会男篮小组赛上,由来自美职篮的姚明及队友刘炜率领的中国男篮与美国男篮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2)沪上举办的网球大师杯、F1 大奖赛、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等品牌赛事中一直活跃着美国运动员的身影,同时在赛事运营、人员交流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上海都与美国的有关机构有着积极而良好的国际合作。例如:2012 年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组委会与美国旧金山马拉松赛组委会签订合作意向,共同分享办事经验,提高办赛水平。

(四) 体育精英引领沪美体育交流的新发展

当前上海正在向全球著名体育城市迈进,以姚明、刘翔为代表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海派体育明星,在国际社会舞台上展示中国形象,并在沪美体育交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002 年,姚明被美国火箭队以状元签挑中,成为第一位没有美国篮球背景的外籍状元。姚明登陆美利坚,是中国运动员第一次成为世界主流媒体的焦点人物。“他以高大的身躯洗去了中国在西方世界的‘东亚病夫’身份,美国人通过他看到了一个来自东方国度的善意、智慧以及现代工业社会的适应能力和生命力。”^①由姚明引发的精英模式效应,在沪美体育交流中

^① 刘冠楠:《论公共外交视阈下中国体育外交的任务》,《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2 年第 11 期,第 16—20 页。

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姚明成为中国在美国的代表,也成为了上海的形象代表,提高了上海在美国的影响力。2002年11月18日,姚明首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时代周刊》曾连续两年把他选入“世界最具影响力100人”,其亚洲版还两度将姚明用作封面人物。在中国体育界,达到这种地位的只有姚明一人。2011年1月17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筹拍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美国播出。此片长60秒,以红色为主色调,姚明也在其中亮相,由于姚明在美国的情感认同和文化身份,使得宣传片在美国取得了积极的反响。

姚明的良好形象,使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美国三任总统克林顿、布什、奥巴马都曾在公开演讲中提及姚明,称赞姚明在中美交流中所做出的贡献,姚明的成功取决于他高超的篮球水平,更来自于他谦虚、聪明、幽默的人格魅力。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格兰杰在其专栏中曾这样评价姚明:“他的魅力人格得以迅速展现,也让西方人睁开双眼,开始审视地球另一端的世界。看起来,他以他所有的积极贡献,诠释了古老中国广博而又深邃的文化内涵——对集体利益和权威的尊重,以及谦逊的美德。”姚明的成功积极地向美国人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卓越价值和优秀传统,这种直接、真实的个人成功史,现身说法、近身展示了沪美体育交流的重要成果。2011年姚明退役后并没有离开篮球,一直为中国篮球的发展做着贡献,也一直在为沪美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2011年底,姚明担任上海公共外交协会的荣誉大使,利用个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继续积极参与到沪美公共外交的实践中。^①

^① 倪京帅、肖焕禹:《体育公共外交使节:公共外交中的有效行为体》,《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年第12期,第30—34页。

四、现代沪美体育交流的价值及思考

(一) 建设体育强国,共赢、平等、尊重之健康发展理念

从沪美体育交流的历史进程来看,近代沪美体育传播交流中,美国一直是强势的一方、主动的一方,上海是弱势的一方、被动的一方。沪美体育传播带有明显的单向流动的模式特征。按照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中西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必然要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冲击,中国文化并不会立即主动地接受和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要不断地进行抵制和反抗,这是对外来文化最本能的回应”^①。同样在沪美体育交流过程中,西方体育在上海植根,也必然会受到海派传统体育文化的冲击。中外双方在体育交流过程中都要不断作出调整和回应。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关键要素是文化认知、认同和行为改变。到了现代,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增多,长期以来沪美体育交流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开始逐渐发生变化,沪美体育交流互动频繁,体育交流正朝着平等、互利方向发展。沪美体育交流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历史进程,是与近代中国遭受外来侵略和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因此中美体育文化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建设体育强国。^②

(二) 构建东方体育文化的话语体系,主动将东方体育文化向美国传播

国际话语权是掌握国际关系事务主导权的核心要素。在国际事务中掌握话语权,才能掌握主动权。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首

①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② 倪京帅、张业安:《体育塑造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演进历程及价值转向》,《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第28—32页。

的西方文化的全球化,体育文化亦是如此,当今世界的主流体育项目是在英国的户外运动的基础上,在美国开展职业体育,形成了独有的西方体育文化。当今世界的国际秩序一直以美国为核心并由其主导,以篮球、棒球、橄榄球等为代表的美国体育,在世界上处于主导和引领地位。在 21 世纪新的国际秩序中,在确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同时,中国应在各个领域展示“大国风范”,中国要有与之相应的国际话语权以应对国际关系发展带来的挑战。^① 因此构建东方体育文化的话语体系,主动将东方体育文化向美国传播显得尤为必要。增强中国体育的国际话语权,构建东方体育的话语体系,更是一个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重要基础。为了推动中美体育交流的健康和谐发展,中国必然需要在国际体育事务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运用有效的体育国际话语权积极向美国乃至世界传播中国体育。在此背景下,作为地方交流的沪美体育交流,需要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体育组织的活动,展示沪美体育交流的理念。

(三) 加强公共体育外交建设,促进民间的相互了解

在公共外交时代,各国政府更加普遍重视体育公共外交的特殊作用。“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善于通过柔性化的手段,实现刚性的文化软实力目的”。^②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正越来越密切和复杂,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需要体育公共外交。根据中美两国国情,加强体育公共外交建设,通过体育文化交流使民间相互了解,不同文明相互借鉴,不同民族减少误解、增进友谊、加强互信,达到文化认同。体育精英是公共外交行为体的重

^① 倪京帅、张业安:《体育塑造近代中国国家形象的演进历程及价值转向》,《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第28—32页。

^② 《十八大明确了我国公共外交的新目标》,《南方日报》,2012年11月21日。

要组成部分,作为社会舆论领袖,在公共外交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国际社会和世界格局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国家资源的直接支持下,吸收优秀的体育精英代表,形成一支精干的体育公共外交使节队伍,有效地贯彻国家公共外交策略,最大限度地建立与国外民众和社会的直接联系。同时公共外交部门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挖掘,并通过创设机制,把这些人力资源整合到外交轨道,不断探索公共外交的新思路、新领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谊。

(四) 加强两国体育文化教育研究,共享体育健康生活方式

美国是世界竞技体育与教育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有一套完备成熟的青少年培养体制。在美国的教育理念中,教育和体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体育是一种教育,其核心价值是对人的教育。只有体育融合在教育过程中,其教育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体育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达到精神与身体健康的高度统一和谐,使之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只有这种身心健全才是完美和有意义的。美国学校体育在政策保障、培养体系、教学方法、师资培养等都有很多的经验,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有很多的启迪,中美体育教育交流是未来中美实现互鉴融合的重要领域。因此,应加强两国体育文化教育研究,汲取体育文化精华,取长补短,使两国人民共享体育,建立健康良好的生活方式。

五、结语

随着美国第 45 任总统特朗普正式宣誓就职,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在中美关系前景引发热议的当下,地方人文交流成为了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时代,体育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和交流功能,体育在国家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国家关系在

体育交流中被理解、认同和强化。作为地方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沪美体育交流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纽带和桥梁。中美关系发展中一直存在着体育精神,具有普世意义的“体育精神”首先在于平等尊重、互利合作之共赢理念。任何的比赛都有输赢,但在输赢之外最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公平竞赛,共同提高。中美关系是共同发展的关系,不是你赢我输的关系,当前两国正在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中美两国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美经济利益相互依存,中美只有在平等、发展、互利的规则下协同合作,才能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
